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空间转向

王 瑜

摘 要:时间是文学创作中的重要问题,时间性构成了文学的逻各斯先验样态。文学时间叙事贯穿着因果逻辑和线性思维方式,从而步入历史决定论和进步论的窠臼,其背后是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逻辑。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越来越多地从关注时间转向关注空间。文学空间不仅是作者创作的场域,更是社会实践和价值判断的对象化载体。文学空间的生产蕴含着变革的力量,它不断影响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行为空间。空间批评理论、文学地理学、文学绘图等理论,组成文学空间批评理论谱系。该理论谱系内部关系错综复杂,呈现出传承、质疑、超越、创新的多重关系。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空间转向,呈现出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新研究领域层出不穷、时间和空间相融合等趋势。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论;时间;空间转向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24)09-0157-09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深入挖掘文艺作品的社会历史背景、政治蕴含和意识形态属性,重新审视文艺作品中隐含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知识生产和话语权构建、权力控制模式,勾勒出文学时间叙事所遮蔽的权力结构关系。

一、文学时间叙事的逻辑陷阱

作为文学源泉的生活世界具有时间性,时间性构成文学的逻各斯先验样态。人们对时间本质的认识并不能达成共识。奥古斯丁说:“那末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1]242}时间虚无缥缈,却又无处不在。时间是“春花秋月何时了”的四季轮回,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的周而复始,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慨,是“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的惆怅,是“灼灼岁序,恰似晨雾,今朝欢愉,明日何处”的伤感,是“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流变,是“山中方一

日,世上已千年”的梦幻。人们习惯用时间记录世间万物的发展变化,但时间却也带来无边无际的苍茫感。千百年来,无法释怀。

从人类早期的循环时间观到近代线性时间观,从奥古斯丁的主观主义时间观到休谟的经验主义时间观,从牛顿的绝对时间观到爱因斯坦的相对时空观,从康德关于时间是感性先天形式的时间观到黑格尔关于时间是理念外化存在的否定形式的时间观,从柏格森的“绵延”“意识流”时间观到海德格尔关于时间构成此在的源始存在意义的时间观,人们对于时间的理解千差万别、莫衷一是。物理时间、生活时间、哲学时间和文学时间之间沟壑纵横,熵、作息安排、永恒和线索隶属于不同的话语体系。时间不止是人类创造的一个抽象概念,它是物质的运动和能量的传递,是时钟、速率、金钱的仆役,亦是各种势力明争暗斗的权力竞技场。生命本体由时间所造就,亦为时间所束缚。

时间是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文学创作中的重要问题。伊丽莎白·鲍温指出:“时间是小说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2]602}巴赫金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中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在文学中,时空体里的主导因素是时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

作者简介:王瑜,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间。”^{[3]275}他进一步解释道:“小说这种体裁,从开始形成到发展,都建立在对时间的一种新的感受上。”^{[4]543}勿论创作抑或阅读,时间线索往往是最容易把握的。徐岱认为:“小说对时间的这种依赖性最集中地体现在其建构方式的选择——讲述(即‘叙述’)上。”^{[5]71}失去了时间的向度,叙事往往显得杂乱无章。马大康从时间对文学宏观影响的角度指出:“时间意识变化往往会促成文学形态,及文学整体的变革。”^[6]伊恩·瓦特从时间对文学微观影响的角度,在《小说的兴起》中揭示了两者的关系,即“只有小说中的人物被置于某种特殊时空的背景之中,他们才能是个性化的”^{[7]15}。时间的特殊性,彰显人物的特殊性。E. M.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总结道:“在小说中对时间的忠诚尤其重要,没有哪部小说是不谈时间的。”^{[8]25}时间与文学的耦合,产生精神的共振。

时间在文学叙事中具有绝对权威。自人类萌生时间意识以来,按照时间逻辑记录事务便是普遍规律。文学形式的嬗变,往往与时间和文学关系的调整、变迁和颠覆有着莫大干系。古今中外的各类史书、史诗、传奇、小说、报告文学、民间传说、剧本,等等,无不以时间为线索展开叙事,无不深深地打上时间的烙印。最鲜明地表征时间主导地位的领域,是关于文学史的研究。它以时间为主轴,清晰地记载着文学的发展轨迹。除此之外,在文学大家族中,蕴藏着丰富的时间样态,比如,被因循的时间、被扭曲的时间、被压缩的时间、被抽象的时间、被虚构的时间、被放大的时间、被插入的时间,等等。对时间的处理方式,决定着文学的叙事理念、表达范式和情节勾勒,映射着创作者对生命、生活、世界的认知,反映出文学的发展、进步、丰富和创新。与永无止境匀速流动的直线矢量时间不同,文学时间是从现实世界中抽取和剥离出来的时间。文学对时间定义的无限种可能性,意味着人类对意义追寻的无限种可能性。

文学叙事始终贯穿着因果逻辑和线性思维方式。凯南认为:“因果关系可以由时间顺序含蓄地表示出来。”^{[9]31}时间的自然延续并不必然构成因果,但倘若前者构成后者的必要条件,则它们之间成为因果联系,“叙述”也由此嬗变为“情节”。

文学思维呈现出超稳态的连续性、可追溯性特征,其叙事逻辑是一种显露文学形象整体构成的感性结构。毛姆认为:“人的思维乃是人脑的一种功能,和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受因果律的控制,这些因果律和支配行星及原子运动的那些规律是一样的。”^{[10]69}故事中的情节有一种前后相继的内在联系,总体上遵从因果链的表现形态。福斯特说:“情节同样要叙述事件,只不过特别强调因果关系罢了。”^{[8]75}叙述变成由情节、故事、意象构成的因果链单元时空序列。

福斯特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冗长无比、蠕动不休的时间绦虫”^{[8]24},线性叙事呈现出时间流向的一维特征,文学创作“必须顺着那条冗长无比的绦虫摸索下去”^{[8]25-26},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基本重合。米勒指出:“由于西方主导传统中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假定,叙事被视为因果相接的一串事件。”^{[11]43}在场的语言以线性的方式来描摹实在世界,以线性的逻辑来揭示实在世界的客观真理。“线的模式是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语言中强有力的一部分。”^{[12]144}但是,一旦这一叙事思维机制达到极致,必然会对文学创作产生羁绊。

西方文学鼻祖荷马的创作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荷马史诗中“所有事件都呈现出一种连续不断的、有节奏的动态的过程”^{[13]6}。娓娓道来的口语叙述演绎着历史悲壮,清晰的前因后果道尽世事轮回。荷马史诗显露出鲜明的现时性时间铺陈与完整的前后因果逻辑。亚里士多德从理论上探究了悲剧的线性叙事模式,并提出了情节的完整性原则。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14]21}。那么,应该如何安排情节才算完整呢?亚里士多德提出著名的“三段论”,即“事之有头、有身、有尾”^{[14]25},并且开头、中间和结尾应该是相继承接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式线性叙事理论统治西方文学史两千多年。从荷马的历史叙事到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到罗伯特·麦基的“故事三角”,再到希利斯·米勒的“叙事线条”和“线条意象”,人们对线性叙事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尽管有很多学者试图解构“情节逻辑主义”,但却难以完全否定它的合理性。

因循因果逻辑和线性思维方式脚步,必然会步入历史决定论和进步论的窠臼。福柯认为:“19世纪最重要的着魔(obsession),一如我们所知,乃是历史:它以不同主题的发展、中止、危机与循环,以过去不断积累的主题,以逝者的优势影响着世界的发展进程。”^{[15]18}历史决定论者认为,世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由一条清晰的因果链所决定。爱德华·苏贾(Edward W. Soja)指出:“将历史决定论等同于创造一种批判的缄默,心照不宣地将空间附丽于时间,而这种时间掩盖了对社会世界可变性的诸种地理阐释,扰乱了理论话语的每一个层面,从关于存在的最抽象的本体论概念到关于经验性事件的最为具体的解释。”^{[16]23}进步论的概念被引入社会历史领域,与发展、进化、进步相关的时间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给时间贴上富含活力、生命力、上升力的标签,而空间的地位则受到极大压制,人们只把空间看成是一个没有任何含义的容器而已。

文学时间叙事背后是西方中心主义傲慢。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网络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世界被一分为二——“先进的”与“落后的”、“中心的”与“边缘的”、“文明的”与“野蛮的”、“开放的”与“封闭的”。萨义德在《东方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二元对立谬论:“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17]49}东方被矮化为西方的附庸,“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17]8}。这些臆造的概念通过“时空互化”的手法将多元的叙事结构变成单一的时间叙事模式,所有的地区、国家和民族都是时间叙事序列中的一个点,“落后”的地区、国家和民族只能被动地被占领、被同化、被改造、被接纳。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18]33}。尽管西方学者总喜欢运用“全球化”“现代性”等彰显进步意义的概念,但仍然抹杀不了单一时间叙事的“征服”意图。“边缘”和沃勒斯坦所谓的“半边缘”地区都被裹挟进这一单向度的历史洪流之中,沦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附庸。

文学时间叙事浸润着西方文化霸权逻辑。文

学中的帝国主义观念和殖民话语体系大行其道,文学成为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帮凶和鼓吹手。19世纪是英国殖民扩张最为迅猛的时期,萨义德特意选择19世纪的英国小说为研究对象,力求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他在对这一时期英国小说进行广泛研读之后,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帝国主义与小说互相扶持”^{[19]96}。一个是武力上的扩张,一个是思想上的扩张,两者相辅相成。“帝国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英国小说里那样有规律和经常地出现。”^{[19]83}小说成为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思想武器,发挥着思想占领、思想奴役和思想合理化的作用。小说充当着“巩固、精练和表现现状的一种权威的文化形式”^{[19]105},不断向殖民地发起思想侵蚀的号角,不断呈现和演绎着西方殖民扩张的天经地义。“文学时常表明它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欧洲在海外的扩张。”^{[19]16}这种“参与”建立在文学时间叙事链条基础之上,对树立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文学空间生产的建构逻辑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深入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空前丰盈,“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0]405}。但当资本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危机业已酝酿成熟。线性矢量时间观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将人类带向未知的幽暗。资本、商品、技术嬗变为人类社会的主宰,欲望、占有、消费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精神世界充斥着焦虑、迷惘、空虚。“空间是‘在’时间‘中’的”^{[21]109}观念发生动摇,剥离了历史哲学坚硬内核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萌兴。与都市生活的琐碎、偶然、短促、支离破碎相相应,后现代主义呈现去中心化、不确定、多样化、碎片化、反本质主义等特征。“后现代概念包含一种解放因素,因为它可以使人们从现代的昏蒙视域中,从东方与西方围绕如何正确阐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纷争中突破出来。”^{[22]27}如果说后现代建立在对现代性的批判基础之上,那么,空间转向则建立在对时间决定论的批判基础之上。

空间转向与后现代主义相伴而生。迈克·迪

尔认为:“后现代思想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思想家们重新思考空间在社会理论和构建日常生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空间意义重大已成普遍共识。”^{[23]84}空间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西方学术界甚至呈现出向空间皈依的倾向。空间转向掀起一场思维方式的变革,它对西方社会文化生活和学术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新定向。如果将现代性简单地理解成时间优先性的理论架构,那么,亦可将后现代思潮理解为一种“空间转向”。西方文艺领域的空间转向较为明显。在绘画领域,“印象派”“抽象派”“未来派”“立体派”等流派,用碎片、解析、象征、重新组合等方法替代具象和写实;在影视领域,画面剪辑和画面合成等蒙太奇手法得到广泛应用;在文学领域,场景变易、并置、拼贴、重复、嵌套等空间叙事手法大受青睐。文艺创作领域的空间化转向必然会催生出相应的空间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空间理论的主要构建者。他们深刻地认识到,随着科技进步、社会转型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空间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福柯指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24]13-14}空间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因为“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15]20}。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趋势,福柯断言:“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15]18}他们除了推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间化,还引领了西方人文社科的空间转向思潮。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戴维·麦克莱伦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是回顾一下过去数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难看出,几乎还没有一派思想活动不受惠于它。”^{[25]377}不管是对哲学、文化、美学、艺术等主题的探讨,还是对全球化、权力、身体等问题的思考,当代西方空间理论总是脱离不了马克思主义的身影。

文学空间理论是西方空间理论的重要分支。从文学空间理论建构史的角度来看,约瑟夫·弗兰克、莫里斯·布朗肖、加斯东·巴什拉等文学理论家都深入探讨了文学空间理论,他们提出的文学空间形式论、死亡空间论、空间化诗学论等论

断,都是建构文学空间理论的基石。但他们的一个共同缺点是尚未填平文学空间与社会现实空间之间的沟壑。他们所建构的文学空间理论,更多的是现象学和生存论哲学意义上的文学空间转向。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将文学空间与社会现实空间有机结合起来,擘画了文学空间理论的蓝图。

从狭义层面来讲,文学空间是作者运用语言文字符号,在能动地记述社会现实过程中,构建起来的一种空间样式。从广义层面来讲,文学空间是由作者、文本、读者、批评家共同参与的,在创作、交流、互动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一种空间样式。文学空间是一种描摹性、想象性、艺术性空间,呈现镜像性、构想性、并置性、众多性、延展性、隐喻性特征。按照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论^{①[26]33-36},文学空间属于精神空间,或曰空间的表征。文学作品所描摹的物质世界自然具有空间性,就连它构思、创造、展现的精神世界同样具有空间性,因为精神世界无法完全脱离物质世界而存在。所以,“文学的空间问题已经成为20世纪中叶文化中主要的美学问题”^{[27]251}。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对文学空间的阐释,早已超脱于对其本体论的考察。文学与空间的关系不再是“画师”与“模特”的关系,文学不在空间之外而在空间之内。文本本身就是空间的产物,属于丰富多彩的空间经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文学与空间本身就不是毫无瓜葛的两种知识秩序,两者相互融合、支撑和建构,在文本的创作中实现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大多重视文学空间中的主体性行为、空间结构、文学绘图、生产与再生产等焦点问题,文学空间演变为洞察当代社会中的重大问题和风向的符码,并建构起复杂经验现象的表征,以及各种理论范式、知识系统和规划图景。

① 列斐伏尔提出三种空间样态,即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表征的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s),也可以理解为物质空间(自然和宇宙)、精神空间(逻辑抽象与形式抽象)和社会空间(逻辑—认识论空间)。

当代西方文艺创作与空间体验相互融合的现象日趋明显,文学空间理论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深度渗入文学的本质、叙事话语、艺术规律、身份、立场、审美等论题之中。列斐伏尔认为,他的空间理论可以应用于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δμειωτική/semiotikè)、德里达的文字学(grammatologie)和罗兰·巴特的普通符号学(sémiologie généralisée)^{[28]7-8}。如果说文学空间理论诞生以前的文学创作是叙述和描写的话,那么,文学空间理论诞生以后的文学创作便是并置和拼接。福柯认为,“我们处于同时的时代,处于并列的时代,邻近的和遥远的时代,并肩的时代,被传播的时代”^[29]。世界被割裂为纵横交错、相互缠绕、彼此渗透的立体空间,“世界更多的是能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连接一些点和使它的线束交织在一起的网”^[29],人们的空间体验变得支离破碎。于是,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中没有完整的故事,以乔伊斯和弗吉尼亚·沃尔夫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大胆采用立体交叉式的创作手法,文学创作变成塑造“文学景观”。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从来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含着某种意义”^{[23]83}。文学空间不仅是作者创作的场域,更是社会实践和价值判断的对象化载体。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产物,它的演变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的发展过程。文学空间是意义集合体。文学空间与人类社会实践有着各种交集,文学空间的生产与人类社会实践相互构建。列斐伏尔认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被生产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所生产”^{[30]83}。文学空间不仅建构了人类社会实践的意义,而且努力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在一定意义上,文学空间也是一种思维导图,它以一种生动形象的方式,为人类反省自身行为和探究社会关系提供了独特视角。文学空间的生产固然受制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水平,但反过来讲,文学空间的生产也蕴含着变革的力量,文学空间影响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行为空间。比如,《汤姆叔叔的小屋》引发了美国废奴运动。所以,文学空间的生产也是意义空间的生产。

文学空间充斥着权力,文学空间也是权力空

间。列斐伏尔认为,“权力遍布于空间”^{[31]39}。文学空间是各种权力、力量、势力斗争的竞技场。文学空间有意或无意地渗透着权力的意志,充当着权力统治的工具,“是一种在全世界都被使用的政治工具”^{[32]29}。文学空间所构织的权力结构,往往诠释着各个党派、利益集团、政府部门、阶层、族裔之间复杂的权力关系,其不仅表征着权力结构,而且还是权力支配、左右和掌控的场域。福柯视域中的文学空间是知识、权力和空间的耦合,他把文学空间和规训术融合在一起,试图揭示文学空间生产过程中所遵照的隐秘权力逻辑,以及文学空间如何教化、影响和引导社会,如何控制人、规训人、主宰人,如何把一个个富有个性的人塑造成合乎社会规范的人。狄更斯作品中的伦敦和雨果作品中的巴黎,都是权力中心的表征,而康拉德作品中的帕图森岛则是远离权力中心的“他者”。文学空间充斥着权力中心的优越感。

列斐伏尔的文学空间理论,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逻辑的异化,早已渗透到文学空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会催生出同质化、消费化、娱乐化、泡沫化、碎片化的文学空间,文学空间反复进行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于是,文学空间成为宣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场域,异化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文学空间嬗变为资本逻辑在空间范围内的自然延伸,并不断强化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化。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寄托了他的政治理想。“空间不仅是发生冲突的地方,而且是斗争的目标本身。空间是一种政治和政治的生产。”^{[33]181}资本主义抽象空间内蕴着不可调协的内在矛盾,最终会走向崩溃和消亡。人们绝不会甘心处于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控制、奴役和剥削之中,列斐伏尔呼吁左翼力量加入空间阶级斗争之中,彻底瓦解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生产机理,共同建构社会主义差异化、多元化、包容性空间,最终达至人类自身的空间解放。美国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同样探究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文学空间生产异化问题,他在《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中,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巴黎城市空间生产中的控制机理。哈维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空间

化解读,他认为“对阶级斗争来说,空间组织的生产不是中立的”^{[34]36}。其价值旨趣一目了然。

三、文学空间批评的理论谱系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空间转向过程中,建立起全新的空间化文艺理论思考方式,基本形成了文学空间理论的骨架。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空间理论并不是一个邃密的文学理论流派,而更像是一股“家族相似式”的学术思潮。他们按照各自对于文学空间的理解,来探究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呈现出群雄竞峙的格局。

一是空间批评理论。1974年,法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列斐伏尔出版了《空间的生产》,这部著作的出版在人文社科领域的空间转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至今仍被视为空间理论的扛鼎之作。传统认知中的空间是几何学视域或地理学意义中的空间,人们通常在空间之前缀之以“‘欧几里得’‘均质’‘无限’等修饰性的词语”^{[26]1}。列斐伏尔这部著作拓展了空间的外延,改变了人们关于空间的认知。他严厉批判了将空间视为静态容器、背景或媒介的观点,将空间中的生产变更为空间的生产,认为空间生产是一种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是一种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动态交融的实践过程。所以,“(社会)空间是一个(社会的)产物”^{[26]26}。文学不只传播不同的空间体验,而且还直接参与了空间的生产。文学空间不断进行着各种社会关系的生产,是各种关系的集合、重组与互动。

福柯深入探究了空间、权力、知识三者的关系,并区分了日常空间、乌托邦、异托邦^①三种不同的空间类型。异托邦颠覆了日常空间中的秩序、规则、权力结构与身份认同,是弱势群体的“空间实践”在统治阶级宏大叙事所造就的空间中开辟出来的空间断裂带。异托邦是对资本主义空间宰制、霸权、异化、奴役、剥削的反抗,寄托着福柯追求精神自由、反抗权力压迫、重构文化身份的政治理想。哈维运用“时空压缩”和“空间修复”来描述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表现形态,这与麦克鲁汉的“地球村”概念相类似,但“时空压缩”和“空间修复”突出了“加速周转”和“摧毁障碍”

的资本扩张逻辑。针对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空间非正义问题,哈维给出了“希望的空间——辩证的乌托邦理想”的解决方案。苏贾提出“第三空间”^②理论,对真实空间和想象空间进行了解构和重构,是一种伴随社会文化变迁而转换外观和意义的“复杂关系域”。苏贾在最广义的层面上建构“第三空间”理论,孕育着重新认识空间和塑造全新空间的无限可能性。

二是文学地理学。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其出现是当代文学和地理学融合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一些地理学者把文学作品作为地理研究的重要资料,这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文学作品价值陡增。与此同时,一些文学研究者关注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和地理景观,并探究其背后隐藏的复杂社会关系。这些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催生了文学地理学。“文学地理学是建立在这一普遍假设基础之上的:所有人类创造出来的作品与它所在的地球环境之间存在着必然关联,并且即使在最抽象和最罕有的精神层面,人类的活动也无不表达着这种性质的关联。”^{[35]62}文学地理学是一门实现感性与理性完美结合的学科。对地理学来说,添加了温情元素;对文学来说,添加了科学成分。文学地理学中的“地理”,既包含高山、森林、荒原等自然地理,亦包括城乡、建筑、街市等人文地理。克朗认为,“文学作品或多或少揭示了地理空间的结构,以及其中的关系如何规范社会行为”^{[36]45}。文学作品的选题、人物、场景并非凭空产生,它往往取决于作者对人文地理的理解。文学作品并不是对地理环境的简单描摹,它还提供各种认识世界的方法

① 1967年3月14日,福柯在巴黎一个建筑家小型聚会上,发表了《关于异质空间》的演讲,首次提出并阐述了“异托邦”(Heterotopia)的概念。Heterotopia源自希腊文,“hetero”意为“另外的”“其他的”“不同的”,“topia”意为“地点”“地方”“地域”,所以Heterotopia从字面可译作“差异地点”。另外,Heterotopia还有“异质空间”“异托邦”“异域”等多种译法。

② 苏贾将物质空间称为“第一空间”,精神空间称为“第二空间”,而“第三空间”则是区别于“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既包含又超越“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差异空间”,是一种“第三化”或者说“他者化”的空间。

法。文学地理学实质上是探究人—地关系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

文学地理学的兴起,打破了“一百多年来,文学史的概念‘一统天下’”^{[35]11}的局面,呈现出与文学史双峰并立的格局。文学地理学充满“对元叙事的怀疑”^{[37]4},它致力于研究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和地理景观。卢卡奇认为:“为了使读者真实而完全地理解拉斯蒂涅的特殊的冒险性格,对伏盖公寓及其污秽、气味、饭菜、招待等等进行细节描写,是绝对必要的。同样,为了塑造高利贷者各种不同的个别的和社会的典型,葛朗台的房屋、高步赛克的住宅等等都必须入木三分地详细描写。”^{[38]46}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等“湖畔派”诗人笔中的大自然、狄更斯小说中的伦敦、哈代小说中的乡村,都鲜明地烙上了作者所生活的地理环境的印记。葛兰西形象地指出:“北部意大利产生‘技术人员’,而南部意大利产生官吏和自由职业者。”^{[39]424}很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也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比如,马尔克斯小说中的拉美地区、莫言小说中的高密乡、古尔纳小说中的殖民地,等等。

三是文学绘图。文学绘图是目前炙手可热的文学空间批评理论分支。文学绘图是指将文学作品中的情节、人物、场景等内容通过绘画的方式呈现出来,它是文学和绘画两种艺术形式的结合。通过绘图,可以将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展现他们的外貌特征、表情和动作,让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 and 感受他们的内心世界。此外,文学绘图还可以通过绘制场景和背景来再现文学作品中的环境和氛围。通过绘制细节丰富的背景,可以让读者更好地融入文学作品的情境中,感受到其中的情感和意境。文学绘图的目的是通过视觉形象的表达来增强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受,它能够为读者提供一种更加直观、生动的阅读体验,使作品中的情节和人物更加鲜活和有趣。同时,文学绘图也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存在,并通过绘画的方式展现文学作品中的美感和艺术价值。

文学绘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弗兰克·莫莱蒂、罗伯特·塔利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莫

莱蒂将文学作品比喻为一幅绘图,通过分析作品中的权力关系和政治意义,揭示出作品的深层内涵。他强调文学作品中的权力斗争和冲突,以及作者和读者在这个过程中的位置和角色。他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其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启示,以及对权力关系的揭示和重新构建。塔利多次到访中国,在中国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塔利说:“就我自己而言,我依然是詹姆斯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40]“我的理论基础一直是马克思主义。”^[41]塔利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绘图的概念,这里的绘图只是一种比喻,即“文学是一种绘图形式,所有文学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文学绘图的工程”^[42]。文学绘图不仅仅是描述地理位置和场景,而是通过空间的组织和描绘来传达作者的思想、意图和社会观察。

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空间理论“家族”门户众多,但它们仍具有诸多共同特质。它们都宣称“重新发现”“重新理解”“重新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努力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深入探究美学文艺学基础理论问题,呈现出极大的开拓性、包容性、批判性、后现代性。作为一股具有世界影响的文论思潮,其理论结构内部关系错综复杂,呈现出传承、质疑、超越、创新的多重关系。从总体上看,他们大都承认和接受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延展,进而开拓出新的理论空间。所以,列斐伏尔是文学空间理论的执牛耳者,空间生产理论在文学空间理论中居于基础地位。米歇尔·福柯、大卫·哈维、弗雷德里克·詹姆斯、爱德华·苏贾、雷蒙·威廉斯、罗伯特·塔利等人的思想,都或多或少受到列斐伏尔思想的影响。

不管是私人关系,还是理论观点,列斐伏尔的理论谱系的脉络都是有迹可循的。比如,罗伯特·塔利是詹姆斯的学生,爱德华·苏贾是列斐伏尔的学生,福柯是路易·阿尔都塞和莫里斯·梅洛-庞蒂的学生,其理论观点自然是一脉相承。福柯的“知识—空间—权力”三元研究架构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苏贾的“空间—时间—社会存在”空间三元辩证法则直接受到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的

启发。苏贾的“第三空间”理论建立在列斐伏尔和福柯空间理论的基础之上,“第三空间”的思想明显受到“社会空间”和“异托邦”思想的影响。弗兰克·莫莱蒂和罗伯特·塔利的文学绘图理论,深受詹姆斯·“认知绘图”概念的影响。他们在研究中不断进行交叉、融合和创新,在多样性中锻造统一性,在统一性中孕育独特性,形成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空间批评理论谱系。

四、发展方向与趋势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面临着新的挑战。空间转向的出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内容,空间问题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议题。通过对空间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并为文艺创作和文化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和指导。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空间转向方兴未艾,并表现出一些新特质和新趋势。

一是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强调阶级分析的重要性,认为文学作品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反映。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空间理论也继承了这一观点,关注文学作品中的阶级关系、权力结构和社会分化。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的阶级冲突和阶级意识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文学空间理论揭示了社会不平等和压迫的机制,呼吁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空间理论越来越重视后殖民主义和跨文化研究,这种趋势源于对殖民主义历史和后殖民现实的关注,以及对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和冲突的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通过关注权力、边界、身份等概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和批判方法,探讨后殖民主义和跨文化的议题,为理解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多元文化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是不断开拓文学空间研究新领域。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空间理论越来越注重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传统的空间理论主要关注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而当代的研究开始涉及身体空间、流动性空间、虚拟空间、想象空间等更加广泛的领域。

他们关注文学作品中身体与空间的关系,探讨身体在空间中的定位和权力关系,研究身体的感知、运动和身体经验如何与社会空间相互作用,以及身体在文学作品中如何被呈现和批判;他们关注那些具有流动性和变动性的空间,比如轮船、火车、飞机等空间,强调空间的动态性和变化性,关注人类活动和社会关系在空间中的流动和变迁;他们关注虚拟现实、网络 and 数字媒体等新兴技术所创造的虚拟空间,研究虚拟空间中的社会关系、身份建构和意义生成,探讨虚拟空间如何影响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的阐释;他们关注文学作品中的想象力和虚构空间,研究文学作品中的幻想、梦境和超自然元素,探讨想象空间如何塑造和反映社会现实,以及想象力在促进社会变革中的巨大潜力。这些新的空间概念扩展了文学作品中的空间维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框架,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中的社会性、历史性和意识形态问题,并为我们思考和改变社会提供了更丰富的思考路径。

三是时间和空间复合趋势渐现。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空间理论研究人员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相互关联,将文学作品视为时间和空间的交织体。这一趋势的出现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分析文学作品中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他们不再将时间和空间视为独立的因素,而是将它们看作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要素。研究者关注文学作品中时间和空间的交错和重叠,以及它们对作品意义和叙事结构的塑造作用。例如,对于历史小说的研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空间理论会关注时间和空间如何在作品中交织,以及历史事件如何影响和塑造人物和情节。时间和空间一体化的研究趋势,强调文学作品的时代性和地域性,促使研究者考虑作品在不同时间和空间背景下的不同解读和意义。

参考文献:

- [1]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
- [2] 吕同六:《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上册),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5 年版。

- [3] 巴赫金:《小说理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 [4]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 3 卷),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 [5] 徐岱:《小说形态学》,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 [6] 马大康:《拯救时间:叙事时间的出场》,《文艺理论研究》2009 年第 3 期。
- [7] 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2 年版。
- [8] 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苏炳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4 年版。
- [9] 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姚锦清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年版。
- [10] 毛姆:《总结》,孙戈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2 年版。
- [11] J.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12] J.希利斯·米勒:《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 [13] 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吴麟绶、周新建、高艳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
- [14] 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 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
- [15] 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陈志梧译,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 [16] 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 [17]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 [19] 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 [21]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
- [22]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年版。
- [23] 麦克·迪尔:《后现代血统:从列斐伏尔到詹姆逊》,季桂保译,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
- 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 [24] 米歇尔·福柯:《空间·知识·权力》,陈志梧译,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 [25]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26]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 [27] 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 [28]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1 年版。
- [29] M.福柯:《另类空间》,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 年第 6 期。
- [30]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 [31] 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 [32] 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 [33] Elden S, *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 Continuum, 2004.
- [34]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 [35] 米歇尔·柯罗:《文学地理学》,袁莉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21 年版。
- [36]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37]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车槿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 [38] 乔治·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 [39]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熙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40] 罗伯特·塔利:《文学空间研究:起源、发展和前景》,《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
- [41] 方英、刘英、罗伯特·塔利:《“文学空间研究”三人谈——罗伯特·塔利访谈录》,《外国语文研究》2021 年第 5 期。
- [42] 方英:《绘制空间性:空间叙事与空间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018 年第 5 期。

[责任编辑:修 磊]